

# 訪談

## 逆風說的話：對話廖偉棠\*

Words against the Wind:

A Dialogue with Liu Wai Tong

曾金燕\*\*

Jinyan ZENG

曾金燕（以下稱曾）：

偉棠你好，你成長在中國大陸、長期居住在香港、現在又在臺灣臺北藝術大學做駐場藝術家，有中港臺的生活經驗。你定居香港時的詩歌創作，涵蓋了三大運動的敘事：在香港紀念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記錄並呈現香港2014年雨傘運動和反送中抗議（2019年至今）。今年春天你在臺北出版了《異托邦指南 / 詩與歌卷：暴雨反對》，<sup>1</sup>突出「反對」在詩學上的表達。你的創作長期回應社會現實，與社會運動形成互動。恰逢今年七月一日國安法實施，香港情勢大變，我可否

---

投稿日期：2020年5月29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6月9日。

\* 廖偉棠，詩人、作家、攝影師。1975年出生於廣東，後移居香港，曾在北京生活五年，現旅居臺北。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為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2011年臺北國際詩歌節、2013年鹿特丹國際詩歌節、2016年新加坡作家節等受邀詩人。

\*\* 曾金燕，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系博士（2017），美國科爾比學院橡木學人（2017），以色列海法大學亞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2020）。研究聚焦於中國的文化與政治、知識分子身份與社會行動、社會性別與性、詩歌與紀錄片電影、少數民族等議題。

聯絡方式：nitraria.chine@gmail.com。

1 廖偉棠（Liu Wai Tong）。2020。《異托邦指南 / 詩與歌卷：暴雨反對》*Yitobang zhinan / shi yu ge juan baoyu fandui [A Guide to the Heterotopia, on Poems and Songs: The Opposition of Rainstorm]*。臺北（Taipei）：聯經出版社（Linking）。

從你的詩作〈卅年〉（2019/05/24-28）談起？<sup>2</sup>1989年「六四」的記憶，是否可以說是屬於香港而非中國（大陸）人的？對於身處言論自由控制下的中國人，因為沒有公開的討論、紀念，集體意義上，某種程度上，六四事件是不存在的。而香港人從當年的電視和傳媒圖文、每年的維園紀念燭光、每年唱一樣的紀念歌曲中，認識了六四事件，內化了六四記憶，塑造了集體情感，也區隔了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人和長期有相對的言論、新聞自由和法治的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在2019年寫的〈卅年〉一詩中，你說「晚安，香港」。在記錄2014年雨傘運動的作品〈香港夜曲〉（2014/06/29）里，<sup>3</sup>你也道「晚安，香港」。香港受傷了嗎？漂浪著還是伶仃著嗎？在你的創作中、在當代文學中，香港是什麼？香港是你的安身之處嗎？

廖偉棠（以下稱廖）：

經過三十年的念叨

死者終於全部南下這個城市。

經過三十年的改造

事發地點也終於南下變成這個城市。

這是我〈卅年〉的開頭。過去三十年，我幾乎每年都為六四寫詩以作祭奠、也藉此書寫對中國與香港近況的反思。這次，是我最直接地表達這樣一個觀念：至少對於香港人來說，六四已經不只是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事件了，它這三十年無時無刻不在向香港揮灑它的光芒與陰影，終於成爲了香港精神的一部分——不只是集體回憶、也不只是道

---

2 〈卅年〉與下文的〈二百萬零一〉（2019/06/16），見：廖偉棠（Liu Wai Tong）。2020。《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廖偉棠2017-2019詩選》*Yiqie shanyao du bu hui ximie: Liu Wai Tong 2017-2019 shi xuan* [All Lights Will not Burn Out: Liu Wai Tong Selections Poems 2017-2019]。臺灣（Taiwan）：新經典文化（ThinKingDom）。

3 香港夜曲〉與下文提及的〈詠物詩〉（2014/10/02）和〈夏慤村絕食詩〉（2014/12/05-07）三首詩，見：廖偉棠（Liu Wai Tong）。2015。《傘托邦：香港雨傘運動的日與夜》*San tuo bang: Xianggang yusan yundong de ri yu ye* [Umbrella-utopia: Days and Nights of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臺灣（Taiwan）：遠景（Vista）。

airiti

義責任，而是運動的延續甚至運動的再起波瀾，然後與香港的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再也不能迴避。換句話說，六四並沒有在1989年的北京結束。它成為每一個不願意遺忘的人所選擇延續下去的運動。

我在五年之間兩度向香港道晚安，其實都包含著「保重！」的意思，而2019年的問候更多了一種寄託，希望香港在義無反顧的路上擦亮眼睛大步邁進。在我的創作中，香港首先是我研究這個時代最貼近的實驗品，和我、和其他香港人一起經歷大風大浪，呈現其他國族所不能取代的極為獨特的、選擇未來的能動性。它的滄桑、它的草根、它的尊嚴，都是我珍重的，也給予我的創作以厚實的滋養、決絕的勇氣。

就藝術而言，香港不是一個適合藝術家生存的最佳地方，除了創作自由沒有別的優勢；但卻是適合藝術本身生存的地方，因為這裡始終充滿活力、激盪。詩人的經營始終是在心中，在行走體驗中進行，而不是具體的一項事業、生意。而香港幾乎沒有全職的藝術家，反而讓藝術得以獲得雜質的營養——從每個藝術家的「兼職」中他們遭遇一個獨一無二的世界，這比閉門造車好得多。

在這樣一個城市裡，一個寫作者的觀察必須區別於一個記者、社會學家或者人類學家的觀察，雖然他會借鑑他們的方法。但和我更接近的，是一個攝影師的直覺、是一個科學家的細緻、是一個遊民用身體丈量城市的痛感。所以我一方面把自己當成實驗品扔進這個城市，一方面又把自己當成幽靈，去尋找其他可以對話的幽靈，這樣去給另一個香港招魂、顯影。具體的角度是始終關注邊緣群體、弱勢群體，無論新移民母親、性工作者，還是「魯蛇」等等在發達社會「失去持分」者，都是我重建另一個香港的橋樑，他們是被迫成為「幽靈」的。

另外，港澳文學長期被中原文學邊緣化，殊不知，邊緣正好成了地方文學確立自身的優勢。首先是方言對作家思維的決定性影響，這點在詩歌中尤其顯著，因為詩歌寫作是直接考慮音韻節奏的，不同方言導致了不同的思路以及不同的呈現方式，詩人會首先考慮母語。

香港作為「我城」，於我而言意味著一種「共患難」的感受，如果香港一直風光繁盛，我想我的認同感不會那麼強烈，但當它遭遇厄困，我才意識到我們同病相憐。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會是一個詩人的「安身之處」，我註定還會漂流下去。看似客觀需要的遷移，背後有我強烈的潛意識左右：我本質上渴望成為一個游牧民族、一個波希米亞人，人類目前還不能實現時間的遷移，那就盡可能在空間上移動。每一個我居留過的城市都把它的一部分融入我的詩，就像杜甫對移動的熱衷一樣，在移動中你可以盡可能多體驗不同的命運，無論哪種命運，對於一個詩人都是好的。

曾：

把雨傘運動中的〈詠物詩〉（2014/10/02）和反送中抗議中的〈逆風說的話〉（2019/08/01）放在一起讀，非常有意思。這兩首詩馬上把我們帶到了2014年雨傘運動和正在進行的黑人反送中抗議現場，畫面感十足，而每一個物的意象又是這樣妙不可言，刻畫出抗爭者的靈魂。2014年和2019年，你都曾經在抗議的現場，並且拍攝了大量的照片，可否請你談一談，2019年香港抗爭現場的表達和2014年抗爭現場的表達，在美學上，發生了哪些變化？

廖：

2014年的抗爭多少還帶有烏托邦式的想像，這也是我把我那本書命名為《傘托邦》的原委之一，街頭美學傾向較為浪漫——這種浪漫延續到今天，依然是街頭給予同行者最大的安慰。但當然，短兵相接的文宣多了，有規模有系統形式的藝術表達也多了，這是抗爭者的成熟和意志更強烈的表現。此外，很多五年前還是風花雪月的寫作者投身於匕首投槍般的檄文式的寫作，也顯出不得不為之的壯烈。

說回我自己的詩，如果說2014年的雨傘運動系列詩還帶有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波蘭詩人）式的調侃和幽默，2019年更多的是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德國戲劇家、詩人）的鋒利和曼德爾斯塔姆

（Osip Emilyevich Mandelstam，俄羅斯詩人）的冷峻吧，這跟時代進一步嚴峻起來有關係，與我自己對詩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的思考也有關係。

逆風說的話（2019/08/01）

紙皮說：

不會，我不會把他們交出  
他們以我為盾  
和我一起領受催淚彈的燒烙

雨傘說：

不會，我不會把他們交出  
我是他們的船，他們的翼  
和他們潛行激流，五年如驟雨一剎

便箋紙說：

不會，我不會把他們交出  
我們一起用虹彩拍擊高牆  
我們要做撫慰他們裸足的細浪

鐵馬說：

不會，我不會把他們交出  
他們讓我馳騁，讓我  
四蹄迸出和他們雙眼一樣的火花

人民最後說：

不會，我不會把他們交出  
木棉花在啞啞的街道寫眾人的名字  
血跡遍地也有我的一滴

關於詩和政治，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說過這麼一句話：「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我們都很熟悉，而我的理解是：這個干預不是說我們就是要跟它肉搏，或者說文學家都去參政，而是指我們要對政治當中的健康的因素和不健康的因素都同樣保持敏感，然後在我們詩裡邊傳達我們敏感地感受到的這些因素。

這些因素很可能跟我們的未來有關，很可能它會像滾雪球一樣，從一個輕微的政治現實，慢慢地捲成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整個世界的命運。詩人要充滿對大時代的敏感，對政治中悸動著的種種可怕的東西敏感，然後他嘗試呼喚他的讀者去警醒，這是曼德爾斯塔姆做的；也要對政治中未曾顯現的美好的東西充滿敏感，呼喚他的讀者去實驗去觸碰，這是惠特曼（Walt Whitman）、布萊希特和聶魯達（Pablo Neruda）嘗試過的。

曾：

2014年雨傘運動，你給抗議者寫了兩首絕食詩，2019年的反送中抗議，你為自殺的抗議者寫了兩首悼亡詩。我們分別選一首，〈夏慳村絕食詩〉（2014/12/05-07）和〈二百萬零一〉（2019/06/16），這些抗議者，對自己的生存處境的理解，對可能的生存方式的想象，又發生了什麼轉變？

廖：

（2014年）夏慳村絕食的時候，雨傘運動已經是強弩之末，參與者實施的更多是一種基於革命義務的克己動人的行為。而這次的自殺者，是以死明志，並寄托自己的決意於生者身上，所謂「功成不必有我」，這種大義凜然，對之後三個月的抗爭定下了很高的道德標準，成爲一種精神感召力。而抗爭者每次清點行動人數都會加上「零一」、「零二」等，也是表示了這種共同體的締結不可分割。最近我還爲「被自殺」的少年們寫了一首詩，也許有助更清晰地理解他們與我之間的關係。

# airiti

15歲輓歌 (2019/10/12-16)

我的15歲，沒有認識像你一樣的少女。

只是把一年前汗污的白飄帶鎖在抽屜深處；把自己始終用一件深藍色牛仔襯衫裹緊。當和你一樣的15歲少女問起，我不會告訴她曾經有坦克從我肋骨犁過。

就像你今天也無法向我解釋  
你的身體如何以潔白迫降漫天血雨  
這鬼城楚楚是你我記得彼此的面目  
我們是鳥和魚嗎  
只剩下真空和暗海是我們的航路？

誰浮沉於我們  
懸掛一顆星在我的脊柱  
月光照亮的只有一桌亂書  
一個少年曲身往裡打撈  
可以拼湊出未來輪廓的另一些少年的遺骨

濕漉漉，鐵錚錚  
是刀子，不是音符  
我的15歲淹沒在洪水中黑暗魚腹  
你沿途按響這些死者的門鈴吧  
給我打電話吧，用那張  
燒起來了的電話卡

我多麼希望時間能崩壞如我倆擦肩而過的車站。  
深呼吸，所有的氧氣都高呼缺氧，你撞擊這個星球它引以為傲的百分之七十的水的時候，所有的喊聲——所有我曾經以為是水在喊痛的聲音。原來都是赤炭入水沸騰爆裂的聲音。

曾：

如果說，每年維園六四紀念唱的歌還是民族主義情懷強烈的歌曲；如今《願榮光歸香港》變成香港人的歌，本地香港社運人士，多少都有不再願意把香港問題放在中國政治背景下討論，不願意把解決香港面臨的問題當做是解決中國一黨統治問題的一個步驟或一個工具。但是，如果沒有中國的民主化作為一種出路，不僅香港（以及西藏、新疆、內蒙古）自身的生存方式在消失，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和生存方式也備受威脅。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在發現初始因缺乏信息透明給全世界文明帶來的後果，就是一個例子。你如何理解香港抗議中人們對待中國的情感？以及一些抗議者在社會運動中的排他取向？如何重新闡釋團結（solidarity）、中港關係對香港議題的意義？可否請你具體談一談對可能的生存方式的想像？

廖：

我個人當然堅持認為中港人民團結的必要性，香港無法在強鄰之側獨善其身。但不得不承認，是中國大陸民意的轉變造成了香港大部分社運人士的失望和切割。一方面是毫無下限的小粉紅們的「人滾地留」的叫囂，另一方面是大陸有識之士的怯懦沉默，他們不堅決與被洗腦的同胞、法西斯般的言論切割，憑什麼要求香港人不切割呢？「我愛中國人，中國人愛我嗎？」你所說的香港本土民主運動人士難免會這樣想。本次運動更加如此，在大陸強悍的國族主義凝聚力宣傳下，選擇性報導的誤導下，不少原本同情香港的大陸自由派人士都動搖了，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力，一再向香港抗爭進行道德苛責。這讓人心寒。

我對香港資本主義、地產霸權的批判是持續不變的，這無關乎政治立場，而是一個人的基本良心，目睹荒誕而必須說出來，不要讓荒誕成為皇帝新衣。香港有全球最高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最可怕的貧富懸殊；但是也有尚好的福利制度、有機共存的社區關係，這些都是香港的基礎，作為詩人要看最根本的、最人性的細節，作為評論人更需要向誤解的一方平和呈現這一切，即使這個通路越來越窄，我

仍然不想放棄讓他者理解我城的可能。

就我個人而言：我喜歡一個詞「挺身而出」，也始終相信一個詞「坐言起行」，詩就是我的「出」和「行」。詩人本哀樂過於常人，是所謂激情，而好的詩人更能在過人哀樂當中看到晦暗、看到幽冷，所謂「其心苦，其詞迫」，便更需沉雄之力安穩之。我始終是自由左翼的社會批判立場，無政府主義也始終以其博大無私的精神、變化富有想像力的行為方式保持我和我的詩的健康。過了不惑之年，更需要理性去保護自己的感性，辨別感性當中最珍貴的部分。

中年以後，家庭的制約更大更明顯，很坦白的說，我放棄了青年時藉著攝影師身分進行的大多數遠遊，又回到少年時代的紙上臥遊……希望我五十歲之後能夠再次把自己拋給活生生的這個世界。比如說重拾攝影師舊業，深入某些我始終關注的主題，最後在文字上和影像上完成一些大作品。與之相應的生存方式，可以是很簡單樸素的。

至於群體的生存方式，我當然嚮往無政府主義的互助公社，正好兩年前寫過一首詩給我的小女兒，描述了未來那樣一種不可能的可能狀態：

其後——給湛衣（2017/3/2-3）

後來有兩百人成為詩人

一百人成為麵包師

五十釀酒師

又兩百人耕種和手作

五十人漁獵

這樣足夠了

足夠愛一個島嶼

其後

孩子們學會在雲上走

airiti

父母都被放棄  
雨灑日曬，不求甚解  
裸露的身體結孕果實  
這樣足夠  
足夠再生一個海

最後一人在酒甕中甜睡  
夢見千千萬金屑  
自過去的城邦剝落升起  
我有一首輓歌  
不打算帶往未來  
你的笑靨足夠  
清空我的時代